

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11-16

2011年3月29日

歷史不容春秋筆法

— 讀夏先生〈四渡赤水評價考〉

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 張幸仔

夏宇立先生在《炎黃春秋》上發表的〈四渡赤水評價考〉，從軍事上的得失和參與者的評論兩個角度，意圖質疑毛主席四渡赤水“用兵真如神”的那段歷史。作為一個改革開放後出生，從軍12載，對軍事頗有興趣，同時編輯過夏宇立先生書稿的晚輩，我想談談個人對這篇文章的看法。

夏宇立先生在〈評價考〉中，坦誠“通觀四渡赤水的全過程，已經很清楚，處於劣勢的中央紅軍在數倍於己的敵軍之中艱苦轉戰，並最終擺脫了敵軍，這的確了不起，值得大筆褒揚讚頌。”說明夏宇立先生認為從戰略上講，四渡赤水通過積極運動與作戰，粉碎了蔣介石的“追繳”並且“合繳而聚殲之”的戰略意圖。

紅軍不但逃出了六倍兵力的圍追堵截，而且在蔣介石已經看

出其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意圖後，利用戰略上的欺詐，奔襲貴陽調動敵軍注意力，成功渡過烏江，邁出了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重要一步。

可是，在夏宇立先生看來，這個成績不算什麼：“然而，話又說回來，當年紅軍在轉移中，面臨強敵的圍追堵截是經常的，而紅軍通過自己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，粉碎敵軍的圍追堵截來實現自己的戰略轉移目標和任務，又是十分正常的。否則，只能面臨失敗的結局。”而且其他紅軍部隊“同中央紅軍比較，顯然還都有兩個方面的比較優勢：其一，損失相對較少；其二，沿途都還創建了新的根據地”。

凡事，有因才有果。紅一方面軍是帶著黨中央一起行動的，而且受到蔣介石直接指揮的國民黨嫡系部隊外加地方武裝圍追堵截，紅二和紅四方面軍如果被圍殲，並不代表黨中央的滅亡，至多是一場軍事上的失利，而如果紅一方面軍在長征中滅亡，中國歷史將被改寫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將被改寫。

機動靈活確實是我軍以弱敵強的法寶，但是這正是紅一方面軍在開始長征時，所可望而不可及的。從江西于都轉移出來的不僅有部隊，還有中央政治局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各部門、中央軍委各總部、兵工廠、印刷廠、製幣廠甚至印製郵票的設備。彭德懷管這叫做抬著棺材走路。這副擔子是紅二和紅四方面軍所沒有的，即便完全丟掉不必要的輜重，大量非戰鬥人員，仍然會拖累部隊的機動能力。這就要求中央紅軍在行軍時，戰略欺詐與戰略機動相結合，不然在敵軍重兵圍堵之下談機動，那是天方夜譚，在李德的領導下，不要說戰略欺詐，連機動靈活都是奢望。

中央紅軍如果停下來建立根據地，那更是蔣介石所盼望的事情，紅軍離開于都經過湘江之戰的慘敗後，實力銳減，當時被五、

六倍的敵軍追剿。本來，地方軍閥武裝為了不在與紅軍的戰鬥中消耗自己力量，被蔣介石趁虛而入，願意以追代剿，如果紅軍站住腳建立根據地，等於侵佔地方軍閥的地盤，那軍閥對待紅軍的態度就不同了。

紅二和紅四方面軍的比較優勢是建立在紅一方面軍的比較劣勢上，夏先生的這種比較是為了比較而比較。

〈評價考〉中，描述了張聞天、彭德懷、林彪、楊尚昆、黃克誠甚至朱德和劉少奇都對毛主席在四渡赤水中的軍事表現不滿（更不要說李德和博古）。很難想像這些我黨、我軍卓越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，是如何在極度不滿後又漠視毛主席繼續行使領導紅軍的權利。按作者的話，毛主席指導下的四渡赤水：“連續‘亂碰亂撞’，打了一連串的敗仗、窩囊仗”。然後，毛主席在“明白了權謀的極端重要性”後，組成了周恩來、毛澤東、王稼祥三人軍事領導小組。

李德軍事上的失敗，必然導致其退出中國革命的歷史舞臺，既然四渡赤水如此失敗，僅憑“權謀”毛主席就可以不顧批評而穩坐釣魚臺，還能反手再去批評林彪“是個娃娃”，張聞天“是個書生”？林彪說四渡赤水“走弓背路”，張聞天說是“打圈子”，而國民黨追擊部隊的師長萬耀煌卻說：“共軍轉個彎，我們跑斷腿”。我黨我軍的領導幹部都是身經百戰的革命者，生死存亡之際，連共產國際派來的洋顧問都敢讓他下課，毛澤東卻能越級依靠“權謀”上位？

周恩來、毛澤東、王稼祥三人領導小組，王稼祥被作者質疑不懂軍事而成為毛主席耍“權謀”的證據。戰場形勢瞬息萬變，即便現今美國軍事獨步天下，還要專門照顧“時間敏感”目標。不惜重金打造一小時全球打擊系統，而紅軍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，就進攻打鼓新場還是魯班場，竟然組織 20 人的軍事會議，一連商量兩天。《孫子兵法》〈計篇〉記有五事，第一就曰“道”，所

謂道的目的是“令民與上同意也”，然後才能“可以與之死，可以與之生，而不畏危。”那麼 20 人的會議，爭論激烈，一天都談不下來，是因為李德等人這個“上”由於連續的軍事失敗，已經無法被信任。沒有“上”的紅軍等於是沒頭的蒼蠅，怎麼談“同生共死”。此時的紅軍是“最後五分鐘”，毛主席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竟然要被說成是“權謀”所惑……

夏宇立先生在文中提到三渡赤水前，毛主席因“情緒上有些激動和陶醉”不聽林彪和聶榮臻的建議，不打較弱的黔軍，而非要和蔣軍嫡系戰鬥的情節：

會上，毛澤東向大家表示，打鼓新場不能打，“打又是啃硬的，損失了不應該，我們應該在運動中去消滅敵人嘛”。

而與會的大多數人都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見，認為應該打打鼓新場。而進攻魯班場的戰鬥也沒有達到預期。作者由此來佐證毛主席“亂碰亂撞”。

根據作者在文章其他部分，也引述過的《楊尚昆回憶錄》所記：

毛主席堅持不打，理由是紅軍主力要在兩天後才能趕到打鼓新場，那時滇軍和黔軍也將趕到，加上川軍的側擊，“打又是啃硬的，損失部隊不值得。”¹

根據 1935 年 3 月 11 日毛澤東、朱德和周恩來下達的《關於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》：

據昨、前兩天情報，猶（禹九）旅已由西安寨退澧水，如見我大部則續退新場。滇軍魯旅已到黔西。12 日可到新場，安、龔兩旅則跟進。依此，我主力進攻新場已失時機。因我軍 12 日才能

¹ 楊尚昆：《楊尚昆回憶錄》，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 年，第 132 頁。

到達新場，不但將為黔滇兩敵所吸引、且周（渾元）川兩敵亦將出我側背，如此轉移更難，所以軍委已於 10 日 21 時發出集中平家寨、楓香壩、花苗田地域之電令，以便尋求新的動機。²

由此電文結合戰鬥後紅軍迅速三渡赤水，我們可以看出此次戰鬥，除消滅敵人外，更主要是為了吸引敵人的注意力，為再次進行戰略機動做準備。因此，戰鬥的關鍵除了消滅敵人外，更重要的是不能“轉移更難”。就連蔣介石都看出打鼓新場是“共匪西竄的必經之路”佈以重兵，紅軍自己還送上門去，顯然不是我軍的作風。夏宇立先生學者出身，是研究紅軍歷史的專家。為何偏偏要忽略掉以上的關鍵文字？難道真如黑格爾所說“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：人類從來就不會從歷史中學到什麼”。

另外，打魯班場雖然有損失，但是從戰略上看，國民黨中央軍裝備和訓練普遍都好於地方軍閥。因此，紅軍打地方軍閥合乎常理，不但林彪、聶榮臻這麼想，連敵人也這麼想。所以，進攻打鼓新場不存在戰略上的突然性，而進攻魯班場則不同，正是由於魯班場敵人裝備較好，能力較強，又是嫡系部隊，因此有鬆懈的可能性。這符合中國軍事上的虛實轉換的觀念，如果都是堂堂之陣，紅軍很難說不會有更大的損失。

畢竟長征不是長征組歌，如果說長征組歌不夠客觀，那麼以不客觀對不客觀，就能對沖出真實的歷史、真實的立場？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，曾經在特殊的年代被神化和符號化甚至簡單化，以至於這段歷史竟然在很長的時間裡，不能被隨意觸碰，甚至人為地造成了對當時參加過長征的部分老紅軍的傷害。多少年後，當環境允許

² 姚有志、李慶山：《紅軍舉世罕見的二十大戰役》，白山出版社 2008 年，第 262 頁。

人們獨立回顧與思考那段歷史的時候，躍躍欲試之後卻發現在歷史的鉅大慣性下，對歷史的反省變成了被反省歷史的延續。

在當時險惡的內外環境中，中國工農紅軍突出重圍，只許打勝不許打敗？毛澤東真是神，撒豆成兵，殺蔣介石如探囊取物。用得著 28 年武裝鬥爭？但四渡赤水走弓背路，虎口脫險不算“用兵真如神”？民族生死存亡之際，路線鬥爭敵死我活，是大環境逼出來的，人品道德修養只是小事小非。

小布什 2007 年 6 月 12 日在華盛頓出席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揭幕儀式時，稱共產主義如恐怖主義，20 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死亡最慘重的世紀。共產主義在這個世紀裡奪走一億人性命，光是在中國就有數千萬受難者……按這個邏輯演繹下去，挖掘細節，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，鬧革命反而成了恐怖主義，那麼好的印第安人自然就是死的印第安人！

如此種種事事生非，清算的是戰爭本身，還是革命本身？如果革命有錯，剝削就有理。帝國主義戰爭，殖民壓榨奉天承運。如果革命無罪，革命中的矛盾客觀存在，有歷史局限性。也不能神是怎麼造出來的再怎麼放倒。美軍千里迢迢跑到伊拉克，推倒薩達姆銅像，世界矚目，全忘了當年兩伊戰爭自己火熱“支前”的忙乎勁。小布什父子血債纍纍全是薩達姆的錯？

研究歷史不是描畫誰好人誰壞蛋，好壞人的故事，而是研究歷史所揭示的內在規律。別一講歷史就拖泥帶水，理論聯繫實際，借古喻今，翻歷史舊賬。當年把長征神化和簡單化，只突出一方面軍，放大主要人物作用的樣板戲“唱法”，都是違背歷史規律的；現在落井下石，全面否定，還是沒逃出樣板戲“敵遠我近、敵暗我明、敵小我大、敵弱我強”的窠臼。